

向史學偷師：個人研習概念史的心得，及從糾結的現代性
對現代中文概念形成的初步思考

湯 志 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ctang@gate.sinica.edu.tw

Tel.: 02-26525084

*Learning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Some Reflections Based on My Studies of the
Conceptual History*

Chih-Chieh T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一、班門弄斧冀有所得

身為社會學家，我今天能在這個場合與諸位史學界的先進共聚一堂，報告個人研習概念史的一些心得，備感榮幸，但也極度惶恐。坦白說，我關於這方面的學習與研究純係土法煉鋼。如果面對的是社會學的聽眾，我對自己的掌握與了解或還能有幾分自信，也自認多少尚可做出些貢獻。我會在幾年前動筆撰寫相關的文章（湯志傑，2009a；2009b），無非也是基於可向史學偷師的想法，鼓吹本地社會學者自概念史取經，希望有助於反省我們早已習而不察，當做毫無問題與爭議的日常分析工具般在用，完全遺忘它們其實是複雜歷史產物的概念。而我做此倡議的最終目的，則是指向本土社會理論的建構。

因此，當潘光哲兄邀我參加這場工作坊時，在受寵若驚之餘，卻也令我感到頗為躊躇。一來我自知自己的效顰之作難入行家法眼，何況立論的目的與脈絡頗有差異，¹二來我這些年來在這方面可謂毫無長進，實在拿不出什麼可見人的新東西。沒想到光哲兄大方到難以置信，允我盡可以舊作充數，徹底懈下我的心防，加上時日仍遠，而我曾稍留意過翻譯社會學的議題，想說或許可在舊稿的基礎上略增些關於翻譯的討論交差，就鼓起勇氣答應了。畢竟，能得史學專家親自指正的機會十分難得，若顧慮顏面而錯失此寶貴的學習良機，不免因小失大。所以，我純粹是抱著學習的心態來參加，尚望各位方家不吝賜教。

二、從觀念、詞彙、概念的釐清談起

既然要談概念史，那麼區辨觀念、詞彙與概念的異同，理當成為第一要務，

¹ 我在舊作中對橫跨許多學科的著作的回顧，多是就能否有助於建構本土社會理論此一問題意識來評論，不但自始視角上就有所偏重，極易忽略原作的學術貢獻，加上篇幅與個人學力的限制，許多的論斷不免是脫離原作脈絡，在不考慮原作所屬學科的評判標準下的不公月旦。做此澄清並非想撇清我實際上避無可避的言責，只是想再度強調脈絡與預設讀者的不同會造成關鍵性的差異，特別是因為在諸般因素的限制下，儘管我現在轉移到歷史學的場合發言，卻無力隨脈絡的改變做全新的發言，而不免與舊作多有重疊。

亦是它不容迴避的課題。然而，這卻似乎是個終究無法徹底解決的難題，考慮到中、西傳統間的異同，特別是概念、觀念最初可謂皆是譯自西方的概念，在人們長期使用中累積下來的用法及意涵極為混雜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幸好，概念史的研究本身便能充分回應此一問題，做有效的釐清，提供足以支撐概念史研究的線索與依據。

概念史劍橋學派領軍者之一的 Skinner (2002: Chap. 9)，在評論 Raymond Williams 的《關鍵字》時，便批評 Williams 的進路有將詞彙與概念等同起來的毛病，忽略了區辨兩者的重要性。Skinner 為此特別舉例說，儘管「原創」一字不曾出現在 Milton 的《失樂園》中，但就他的思想來考察，可確定他認為原創性對詩人來說極其重要，故無礙於我們說他有原創性的概念。Skinner 要強調的是，理解如何正確使用相應的詞彙，並非擁有某概念的必要或充分條件；反過來，能正確使用相應詞彙、自認擁有某個概念，仍有可能誤解其內容。從這個角度來說，就某新概念發展出相應的詞彙，也就是「詞彙化」(沈國威，2010: 6)，的確可視為個人或社會有意識地擁有這個概念的確定記號。在此意義下，詞彙與概念的確有一系統性的關係，但終不宜混而為一，因為並非所有的概念都會詞彙化。更重要的是，很多時候，人們是受到尚未充分詞彙化的概念所指引才行動的，就像我們今日理解的歷史上許多重要的「革命」，當時不見得都會直接打出革命的旗號(方維規，2009: 131)。

依今人的常識理解，不少人或許會說，Milton 固可視為原創性概念的先驅，但他本人對此概念怕仍僅有模糊、素樸的觀念，要待百多年後原創一詞被創造出來，人們對原創性的概念才真有清晰的了解與掌握。將觀念看做比較模糊的狀態，而認為概念代表相對清楚、有意識的狀況，為如今一般人的通見。這也清楚地反映在鍾少華《中文概念史論》(2012: 2)對觀念與概念的區分上一或需加上從哲學的角度而言的但書：觀念是「記憶以及想像等浮現於腦海中的具體印象，即是直觀內容。觀念是特殊的、個體的、具體而又孤立。觀念用語義表示出來，就是一個不完整的語義，邏輯不嚴密，難有公信力和公允性。」相對地，「概念

的起源是由於人們對於具體複雜的事物的認識逐漸淡漠，而漸漸變為記號。記號的移用而至於普遍，形成共相。概念再把各種觀念相互聯絡集合，經過驗證，統一成為全體的普遍的要素，進而為思考表述的對象，以求準確的知識。」因此，對他來說，「從觀念發展進步到概念，就是人們認知中重大的一步，尋覓表述人們情感最清晰準確的詞語概念。概念與觀念有本質區別。觀念是表象的，是特殊的，包括一個。觀念實際存在，屬於心理範疇；而概念則是普遍的，包括一切。概念非實際存在，是意念，屬於邏輯範疇」（鍾少華，2012：4）。

依此，觀念、記號²與概念三者就達成認知的任務來說，似有一逐級遞進的關係。至少，鍾少華（2012：3）明確強調「從觀念昇華至概念的漫長複雜過程的一般程序」是「概念史研究的關鍵程序」。在把觀念定位為不具知識價值的具體直觀的情況下，鍾少華把心力全放在探究所謂的概念上。鍾先生這樣的理解與做法，我覺得很難說是錯或不好。只是，從概念史的角度來說，我必須說此一觀點係特定時代理解下的產物，以此作為概念史研究的立足點的話，怕不夠完整，也有欠適當。

由於未附外文，我不清楚鍾先生文中觀念一詞指的是 *idea* 還是 *notion*，但顯而易見不會是前例中 *Skinner* 所說的 *concept*。在我看來，這一差別正直指概念史研究的核心立場。身為概念史研究的大家，*Skinner* 在遣詞用字上理當十分嚴謹才是，他難道不知道概念應當有嚴謹、明確、不自相矛盾的定義，才能有助於準確知識之累積嗎？為何他依然選擇用概念一詞來稱呼 *Milton* 心中僅是模糊感知到的觀念呢？雖然 *Skinner* 在前引文中並未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他以及其他概念史家的研究無疑皆立基於挑戰前述看法的相反假定上：「概念本質上是有爭議的」——借用 *Gallie*（1955-56）的標題來說。

鍾少華對概念的看法之所以會與 *Skinner* 有此關鍵差異，在於他仍執守於「科學」取向的「古典」見解，而未跟上語言學轉向的發展。要釐清這一點，或

² 記號疑即為字詞，但在書裡的示意圖中，鍾少華（2012：3）明確提到語詞，認為係觀念的表達，且是不完整的語義。依他的看法，語詞中暗昧、混雜、不妥當者，可歸為記號，且在歷史上幾乎註定要被拋棄。惟有那些明了的語詞，因其分明與妥當，才會形成概念，從而表達為語義。

許還是讓我們回頭從對於概念的概念史研究說起。鍾少華（2012：25）猜測，今天英、法、德文中的概念一詞皆源自拉丁文，故應是在中世紀後才陸續形成，因為「在希臘文明時期，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並沒有直接相關的『概念』用詞」。然而，就像前面舉的原創性的例子所顯示的，希臘文明時期沒有概念的用語不表示我們就不能書寫概念在這段時期的概念史。至少，《哲學的歷史詞典》中的〈概念〉詞條是以希臘時期為歷史書寫的起點：

哲學上對於「概念」這個術語的等同項的使用，是隨著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哲學化而開始的，在此始終具決定性的是，邏輯的、心理的及存有論的面向常混在一起，或未充分地區別開來。作為出發點的事實是，人們在言談中會運用特定的表達詞彙，將同一類之多個或所有的對象（事件）關連起來，這因此向人們提出下述的問題，在多大程度上，這些表達詞彙是指稱不變的、獨立於主觀思考與語言的對象，即 $\iota \delta \epsilon \alpha \iota$ ，還是指稱精神中的想法或事物（事件）本身（Haller, 1971: 780）。

眾所周知，在今天一般的哲學史書籍裡，柏拉圖的名字是與「觀念論」或「理念論」——以突顯與理性、理想的關連——連結在一起的。依柏拉圖的看法，觀念不但是事物的「原型」，還是「唯一絕對的客觀實在」，可不是什麼模糊不清的東西（傅偉勳，1990：81，87；羅素，2005：Ch. 15）。不過，Meinhardt（1976: 55）關於「觀念」（idea）的概念史研究也明白指出，若從語文學（philology）的角度精確審視原始文本的話，我們恐怕得說柏拉圖本人尚不識得觀念此一術語，而是用多個不同詞彙表達類似的想法。觀念一詞得以明確的術語化，並固定不變地與柏拉圖連結在一起，得歸功於西塞羅的拉丁文譯本，特別是因為用了 idea 這個外來字，導致讀者將此理解為特定術語的緣故。

這些歷史細節其實無關本文要討論的主旨，我特別繞這一大圈只為突顯兩個重點。首先，今日我們常譯為觀念的idea，一定意義上可謂現在所理解的概念（concept）的前身。其次，我們認為概念所有的特性與功能，其大方向幾乎在

希臘時期便已告確立。這具體反映在希臘文的觀念一字上。從字源來說，觀念清楚表示出與「看」及「知道」的關連，最初係指某人或某物可見的外在形貌，然後被一般性地用來意指事物的被創造性、特徵，最後並被用於分類。這帶來的影響是，一方面認為觀念可為視覺或直觀所了解，³另一方面又強調需區辨未經媒介的感官直接掌握與經智性推論而得的兩種知識類型，即意見與知識（*opinion/knowledge*）的不同（Boas, 1973-74；Meinhardt, 1976）。

如前引文也點出的，柏拉圖最初會引進觀念，可謂是為了回答「共同名詞指稱什麼」的問題。在此，經由抽象的作用得出共同特徵，即扮有關鍵角色。到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以形式取代觀念，試圖發展一套嚴謹的知識或說科學理論時，更強調「科學概念只能是那些能透過定義加以規定的概念…對亞里斯多德來說，當字彙的意涵有限且確定的話，為每個概念找到一個語言上的表達是可能的，反之亦然。如果這個條件無法滿足，人們就無法形成任何概念，甚至根本就無法討論與思考」，所以說「定義作用為概念的根本特徵」（Haller, 1971：781）。

一定意義上，鍾少華所本的立場可謂與此相去不遠。當然，介於這中間上千年的歷史不會毫無影響。值得在此提出來請讀者注意的有如下幾點：一、我們習於視觀念為模糊或素樸想法，其源頭或可溯回到斯多噶學者把觀念解釋為人們的主觀意識，而這幾乎是今天哲學以外對觀念一詞的唯一用法（Meinhardt, 1976: 60）。二、中世紀大致上為以上帝為原型的想法所籠罩，故笛卡兒將觀念定位為人類意識的自我確定性，可謂帶來劃時代的革命性影響——儘管他實際上未能完全擺脫存有論的-神學模型。在多次以觀念為關鍵字的近代哲學肇建的氛圍中，笛卡兒引進以認知理論的-心理的方式來運用觀念的術語，不但標記了意識地位的變遷，更令認識論的取向成為日後的主流。笛卡兒一方面將觀念規定為最廣義的想法（*Vorstellung, notion*），另一方面又從中分出「真正意義下的觀念」，將其規定為對某物的呈現，即「意識的形式」（Halbfass, 1976；Redaktor, 1976）。

³ 一個有趣的對比是，採拼音文字的西方，在談到知識形成時反而常強調看的重要性。相對地，在重視覺的中文方塊字裡，像知、識等與理解及知識有關的字，卻常表現出與言說的關連。

三、在基本上將知識論建立在心理主義基礎上的經驗論那裡，概念又變得等同於「直觀的想法、精神中的圖像」(Haller, 1971: 783)。四、一直要到康德，相關的術語才變得精確化並逐漸固定下來。他清楚地將想法分為直觀與概念，主張「概念是與直觀對立的，因為它是對多個客體共同的東西的一般想法」，它以對象為材料，而其形式則是一般性。他還把概念劃分為經驗概念(Erfahrungs-Begriff)、純粹的智性概念(Verstandes-Begriff)(即範疇)，以及理性概念(Vernunft-Begriff)(即觀念, Idee)三類，主張觀念具有的統一化的成效立基於內在於它們的演繹推理的功能，開啟從運作面向來解釋概念的作法(Haller, 1971: 783; Neumann, 1976: 114)。

我們今日傾向視觀念為主觀的模糊想法，而非客觀事物的原型，同時卻認定概念不但有明晰的界定，且必包括隨著抽象作用而來的一般性，恐怕是承襲在康德之後成為共享的習俗，將直觀與概念對舉的區分方式。⁴這反映在對這兩個來自西方的新名詞進行歷史篩選後的漢譯結果上：我們現在習慣以「觀念」譯idea，好彰顯出其與「直觀」的關連，同時以概念來翻譯concept，以突顯其概括的一面。事實上，依鍾少華(2012: 27-31)對中文「概念」生成的研究來看，華人一開始也是以意想、臆、意思、意見、心思等較為廣泛、模糊的方式來理解concept一詞的。是隨著哲學專業書籍及詞典、百科全書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變得日益普及，且多追隨西方近代哲學的方式來界定、理解概念，著重其為知識工具的面向後，才導致今日的用語習慣。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對概念的討論，不再像過往般聚焦於心靈記號與對象形式的問題，轉而日益著重概念的語言成份。在John Stuart Mill〈邏輯系統〉一文的影响下，古典邏輯對概念的討論愈來愈為語言記號(名字)及其意義(Bedeutung)或意涵(Konnotation)的理論所取代(Haller, 1971: 784-785)。這同樣反映在鍾少華(2012: 2)秉持的立場上：「概念的內部研究，

⁴ 至於實際情形為何，仍有待歷史研究解謎。像提倡「觀念史」的金觀濤、劉青峰(2009: 4)便認定「觀念必須是可以相應關鍵詞或含該詞的句子來表達」，故「比思想更確定」，「和社會行動的關係往往比思想更直接」。

就是研究語義所共有的本質屬性，即意義。概念從外部研究，就是研究語義的範圍。或擴展，或縮小，或嬗變」。

在此架構下，概念史的研究似可界定為對概念的外部研究。然而，「共有的本質屬性」假定卻與概念史的進路有所鑿枘。概念史的基本立場是要將概念歷史化，反對本質主義的假定；或者，如果概念仍有個本質可言的話，那麼最多也只能說成概念本質上是有爭議的。它所銜接的與其說是重視概念的語言成份的哲學傳統，不如說是更為晚近的，發端於哲學但其影響卻不限於哲學的語言學的轉向。用概念史大家 Koselleck (1985: 83f.) 引述的，早在語言學轉向之前便已敏銳地看到問題癥結所在的尼采的話來說：「所有的概念 - [由於]它們以符號的方式對一整個過程做出概括的摘要 - 都迴避定義，只有那些沒有歷史的東西才能夠定義」。

概念史要研究的無疑是這整個無法以定義來概括的歷史過程，因此與只聚焦於載體，著重語義異同變化，僅考慮語言脈絡，但未必考慮整個語義場的結構與社會脈絡的詞彙史有別。⁵舉例來說，就像從權利／奴役演變為權利／義務，或是從自然／神聖變成自然／文明 (Holmes, 1987; 1996: 253ff.; Luhmann, 2001: 3)，儘管詞彙仍維持為同一，意涵也大同小異，但隨著作為對立面的反義語為別的概念所取代，講的其實已是不同的概念了 (Luhmann, 1994: 260)。甚至，就是「同一組」區分實際上也可能有不同的指涉 - 用系統理論的術語來說，也就是未標記的另一面有所不同 - ，因而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不同的」區分 (例如：公／私，見湯志傑，2004b; 2004c)。⁶

概念雖常需要詞彙作為載體，但不必然以其為存在的前提，兩者並非總是合致。那麼，我們究竟要如何區辨概念與詞彙呢？我認為Koselleck (1985: 83-84)

⁵ 我認為，從語言學的角度認為詞彙與概念的區分有問題，或甚至根本無法區分 (如見 Bödeker; Busse, 1987)，實是另一回事。如 Olsen (2012: 180-181) 指出的，Koselleck 拒絕追隨語言學當時流行的符號載體／意涵／指涉的事物的三分，而偏好從社會脈絡的觀點來區別詞彙與概念。

⁶ 就研究華人概念傳統來說，這特別值得注意，我認為謹慎地辨異會是較妥當的研究策略。以孟、荀著名的性善、性惡論「爭辯」來說，雖同樣用「性」一字，但兩者賦予其南轅北轍的意涵，可謂使用截然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構成對立，而是「雞同鴨講」(見蔡錦昌，1996; 2001)。

已對此提供了一尚能令人滿意的「工作型定義」或「操作型定義」，足以作為概念史研究的指引，及證成概念史進路的理論基礎。⁷他指出，就指涉事物來說，詞彙與概念同樣具備「多義」的性質，它們共通的歷史性質正立基於此。然而，在實際的語言使用中，詞彙通常不再模糊多義，但概念要成其為概念，卻**必須維持多義**。這不但是概念與詞彙在歷史研究上的關鍵區別，也是概念史研究與視概念為知識工具的傳統哲學視角分歧所在。有趣且發人深省的是，在Koselleck的眼中，此一具決定性的差異源自概念總有個**一般性宣稱**：詞彙包含許多意涵的可能性，概念則進一步試圖在自身之中將這些豐富的意涵統一起來。傳統哲學觀念認為概念必定達成，且因此才能證成其作為概念地位的一般性，現在卻淪為宣稱，即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對Koselleck及概念史研究來說，概念可以是清楚的，卻必然是多義的。以詞彙的情形來說，意符與意指一定程度上可以分開；在概念卻不然。概念一方面依附在某個詞彙上，另一方面卻又比詞彙來得多。依Koselleck的「定義」，唯有當歷史現實與歷史經驗的多樣性全進到某詞彙中，以致於它們唯有在這個詞彙中才能獲得意義，唯有透過這個詞彙才得以被掌握，詞彙才會變成概念。此一操作性的界定清楚彰顯出，概念史研究不能只看語意、觀念的一面，而必然也需將社會運作、結構的一面納入視野。

在釐清概念與詞彙的差異後，某個意義上也就一併回應了蔡錦昌（1987，2001）對「中文裡沒有概念，只有名義」，從而無法有中文的概念史研究的質疑。蔡錦昌認為中國人的思考方式是「對比式思考」，而不是範疇性的二分法思考。一對對的觀念或字詞並非範疇性的概念區分，無法清楚界定，乃相反相成、相互滲透的兩個面向而已。他認為中國人根本沒有概念，並因此相應沒有命題、理論等。對照前面的討論來看，蔡錦昌顯然對概念抱持著特定的理解。這毫不令人訝異，因為這的確是今日的主流觀點。即便在西方，一般人也多還是主張概念應當儘可能清楚明白、不具爭議、不隨時間而改變，以一定的基本意義或標準意義為

⁷ 鼓吹並從事概念史研究的 Palonen（1999：42），也主張毋須將力氣優先花在極困難且煩瑣的，關於概念、觀念等的辯論上，而不妨先採實用主義的立場作為權宜措施。

依歸。概念史的取徑之所以會帶來革命性的震撼，促成學術典範的轉移，正來自正視概念的歷史與政治性格，將「概念除魅」 - 且容我挪用Palonen（2004）的標題來說。依此，概念不但會改變，更往往是彼此交錯糾結的問題的節點，不單是反映社會現實的**指標**，同時也是介入現實發展的**影響因子**（Palonen，1997；1999），絕非什麼客觀中立的認識工具。⁸韋伯所謂的「理想型」是說明此一問題的絕佳案例。一方面，為了掌握現實，我們勢必得從雜多的經驗中抽象出清楚明白的概念作為輔助的認識工具。然而，另一方面，韋伯也清楚地指出，這必定是個片面強調的人為建構。換句話說，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建構與看法，就像韋伯、馬克思及宋巴特雖然都用了資本主義的術語與概念，但著重點卻彼此有異一般。

三、迄今研習概念史的一些心得

由於我舊作的最終目的擺在本土社會理論的建構上，希望藉提倡概念史研究的進路來鍛鍊本土理論的概念之磚，將重點放在從所謂內在視野的角度，釐清在漫長歷史過程中積澱在概念中，往往代表不同時間層的意涵，期待能由此覓得與西方社會理論的分離點，故特別推崇Koselleck所代表的，《歷史的基本概念》這套詞書所採用的長期、宏觀、貫時性研究。⁹事實上，我認為就歷史研究與分析來說，以Koselleck為代表的德國概念史，英國脫胎自政治思想史的概念史版本，即劍橋學派，源出法國年鑑學派的心態史及觀念的社會文化史，以及在傅柯影響下發展出來的論述分析，可謂各擅勝場，或宜隨研究的主題與目的挑選最為趁手的取徑，毋須也無法定於一尊。像金觀濤、劉青峰（2009）便因視「觀念」為組成思想體系的基本要素，是遠比意識形態穩定的思想碎片，故在理解當代思想狀況的目的下，強調以統計法就關鍵詞進行研究，耕耘出極豐碩的成果。

⁸ 即便是所謂的科學概念，也未必就是純然客觀中立的認識工具。晚近「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研究已多方解構了科學與技術客觀中立的迷思，如見 Callon（2007）從翻譯或說轉譯的角度關於海扇貝的經典研究。

⁹ 另一層理由當然是我留學德國，對此相對較為熟稔並感到親近的緣故。國內懂德文的社會學及歷史學者較少，也是促使我把引介重點放在此的考慮之一。

如Steinmetz (2008) 在回顧德國概念史四十年來的發展時指出的，由於《歷史的基本概念》偏好長期、宏觀、貫時性的研究，以致它的實際研究成果往往描述多於解釋，對於如何及為何的歷史分析不見得總能令人滿意。而這除了受到它最初的任務設定所影響外，也跟Koselleck早期的概念史進路係源出詮釋學的傳統，尚未受到語言學轉向的衝擊與影響有關。¹⁰儘管《歷史的基本概念》這個可謂「空前絕後」的計劃已奠定其不可磨滅的里程碑地位 (Palonen, 2005a)，但就是Koselleck (?) 自己後來也曾用緊身衣的比喻來形容當初為此計畫所撰寫的指引綱要造成的限制 (另見Olsen, 2012)。如果我們追隨語言學轉向的腳步，從建構論的視角來理解社會現象，不再視社會結構為穩定不變的東西，並且主要關心的是語意如何及為何變遷的問題的話，那麼微觀的分析便相當重要。Steinmetz (2008: 187) 便主張，「惟有透過觀察行動情境中的語言互動，我們才有辦法認知到發言者或書寫者如何及為何有時以這樣的方式運用特定詞彙，有時卻以別的方式來用，以及聽者或讀者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理解」。

在這點上，向來著重共時分析的劍橋學派的討論便有不少可觀之處。例如，不論是 Pocock 談到的典範，或是 Skinner 所謂的習俗，對具體的微觀分析來說都是饒富重要性與啟發性的參照。不同於 Koselleck 半途才受語言學轉向的影響，Skinner (1970; 1971; 1989; 1994; 2002; 2004; 2005) 可謂自始便受 Austin (1962) 影響，採取言說行動 (speech act) 的觀點與立場。他指出文本本身並非了解意義的充分憑恃，強調需從 (文本所鑲嵌的語言) 脈絡來了解意義，而不能按當時仍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層建築」教條區分下的「社會脈絡」來理解，在機械反映或直接制約的觀點下視意義直接由社會脈絡所決定。Skinner 特別看重語用的一面，強調修辭不只是陳述，不只是「以言說事」而已，更是爭辯及推動改變的工具與武器，有其「以言行事」、「以言成事」的一面。所以，他主張我們應當從概念在辯論中的用法來考察概念，如此才可真正揭露時人究竟是

¹⁰ 因我舊作的重點不在引介 Koselleck 的思想，故未著墨於此，而比較是將其對於概念史研究的思考當一整體來談。

如何理解及使用這些概念的。而為了達成這一點，理解及掌握同時代的習俗毋寧是必備的基本功夫。

例如，汪暉（2004：Chap. 2）的分析銳利地揭露了，同樣用「物」這個詞彙，可以有極為不同的概念化方式；純粹的、孤立的作為事實的物範疇之所以出現，成為宋明理學的核心議題，係源於事實與價值分離此一道德評價方式的轉變。他能得出此有別於往昔舊說的立論，相當程度上跟他揚棄了傳統思想史文本論的立場，改採脈絡論的立場有關。然而，汪暉採取的畢竟還不是語境脈絡論，而比較接近社會脈絡論，因此他雖敏於貫時的斷裂，但對同時代的象徵鬥爭、對替代論述間的修辭較勁便顯得關注不足，並未細辨同時代的人在使用理、物、利等詞彙、概念時，是鑲嵌在哪些彼此有別的論述中，在意義／指涉／態度（sense/reference/attitude）三個面向上有無差異。也因此，儘管汪暉（2004：116）注意到，與其說道學的某種一致性取決於一種共有的哲學體系，毋寧說取決於道學與其對立物的關係，但他並未從語言行動的角度，對由不同的、彼此競爭的論述共同形成的整個脈絡進行分析，以致一定程度上未能擺脫決定論的陰影，而只是從經濟決定論替換成政治決定論（至少上卷第一部給我的印象是如此）。

另外像金觀濤、劉青峰（2009）既有的研究不但清楚地告訴我們像個人、社會、公理、…等關鍵詞在他們收集的資料庫中出現的次數，進而區辨其不同意涵，呈現其分布外，也提供了作者及相關出處的資料。可惜，基於研究目的設定的不同，他們較少深入追究這些行動者究竟是在什麼脈絡下發聲的。¹¹如果他們願意在既有基礎上進一步澄清當時的各個作者係針對什麼發言，意欲為何，論敵是誰，援用什麼舊的語言習俗或典範，又如何創造出新的語言習俗與典範，相信可以開展出豐富的另一面，令其成績再上層樓，不但有助於釐清特定時段的爭議焦點何在，及分為哪幾種論述陣營，也能更具說服力地解釋為何某一特定新名詞能贏得標準譯名的地位，成為相關概念的主要載體。

¹¹ 金觀濤與劉青峰在實際分析時，其實偶爾會帶進此分析視角，但就其明白提出的方法主張與全書的整體執行來說，尚欠系統性。

在做這樣的探討時，發言者的意圖及其策略性行動常是不可錯過的分析重點，這也是Skinner堅持的立場。然而，我贊同Steinmetz（2008：189-190）的說法，可以用也適合用意圖分析時，我們自毋須拋棄此法不用，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對語意變遷的分析不必然總得溯回到行動者的意圖不可。例如，一般來說，愈有能力將愈多彼此有異的個別經驗圈在一起的詞彙，愈易贏得使用價值。特別是在政治溝通中，較抽象的意符（推到極端即Laclau所謂的「空白意符」）往往能獲得較高的吸引力，因為它們能以內容上儘可能空洞的指稱來涵括儘可能多的行動聯盟。而隨著特定詞彙的策略性使用價值不斷增高，即有助於人們成功地言說及行動時，就有可能導致語意的變遷。Steinmetz視此為語意變遷的三種理想型解釋模型之一，¹²並以Suter（2005）關於瑞士農民革命的分析為例，指革命一詞的勝出極可能便在於其抽象度較高。

另外像黃克武（2008）的研究也指出，嚴復的譯語最終之所以在新名詞之戰中不敵和製漢語的競爭，最關鍵的原因在大眾媒體的影響。換句話說，除了語意本身的因素外，社會結構也起著重大的作用。對言說行動主體及其意圖的考察雖常可做出相當貢獻，卻非惟一的治學方式，更無法涵攝其他研究進路的觀點，遑論取代其成果。像 Foucault 開展出的論述分析就反其道而行，把重點放在「匿名的」論述上，用主體位置的概念取代主體，故能有力地揭露超越黨派之爭、宰制同時代人們思考的知識型，並敏於斷裂的問題。

許多傳統華夏文明的語彙與概念在清末遭到西力衝擊後日漸退出流行，為新誕生且日益普及的、托身於新名詞的現代中文概念所取代，便是個顯而易見的斷裂，而這就涉及 Steinmetz（2008：188-189）提出的第一種語意變遷的模型：因舊詞彙、概念日益喪失可信度與說服力而來的變遷。不過，有別於 Steinmetz

¹² Koselleck（2006：62-63）本人則習慣援引 Heiner Schulz 的架構，認為儘管經驗上充滿無數的變異，但從邏輯的角度來說，概念與事態間的變遷只有四種可能性，並以此為討論的出發點。這四種可能性分別是：一、詞彙的意涵及其所掌握的事態不論就共時與貫時角度來說始終維持相同。二、詞彙的意涵維持相同，但事態已經改變，以致必須在語言上創造出新的概念來重新掌握。三、詞彙的意涵已經改變，但先前藉它來掌握的事態卻仍維持不變，以致已有所變動的語義必須在語言上找到新的表達形式，以符合現實。四、事態與詞彙的意涵兩者的發展完全脫鉤，以致一度對應的關係消失，日後唯有藉由概念史的方法才能偵查出來並予以確認。

舉例探討的情況，清末民初舊有中文詞彙、概念成批地喪失可信度，並非內生的發展，在嘗試錯誤中摸索出來的結果，而是遭致外來的挑戰。相應地，所牽涉到的不只是特定詞彙、論述喪失說服力而已，而是整個既有知識型的崩解。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型的崩解與帝國政治體制的崩解並非同步，而是各有其節奏與時間。事實上，雖然帝國形式上一夕間為共和所取代，但整個政治體制的轉換與取代卻是個耗時的大工程，且未必能克竟全功。至於知識型的崩解與取代，就更是如此了。

這可見證於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文運動者如下的策略：偽裝成古文學者，引發一場辯論，以吸引公眾注意。而他們之所以選擇自導自演的策略，係基於己方的陣營在社會聲望上遠不及彼的緣故（Hwang, 1995）。如章清（2012）以容闈、嚴復及胡適為例的分析指出的，當時社會對留學生的接納程度是隨著時間演進才逐漸提高的，引介外來新觀念、新事物的留學生一開始其實是相當邊緣的。即便是官派的留學生如嚴復，一開始也僅在「技藝」相關的洋務領域才有發言的空間，是披上古文的外衣，為舊士人圈子接受後，才掙得對一般事務的發言權。

這提醒我們要注意翻譯場域的問題（Prunč, 2007），即便當時及今日知名的大家如嚴復，未必便能在翻譯場域中佔據「主流」的位置。這種情況就像Bourdieu（1995）在分析文學場域時所揭露的，贏得文學聲望者往往會輸在通俗性上，而文學上的輸家卻反而可能是經濟上的贏家。精擅西學與桐城古文，講求信、達、雅的嚴復，按理有相對優越的條件兼顧不同的知識取向與品味，盡可能擴大其讀者群，¹³然而其多數譯名卻遭到歷史的洪流淘汰，正反映出譯名的篩選並非全按譯者聲望的階序來決定，而有更為複雜的因素介入其間。

首先，如已指出的，質與量在翻譯場域本身中未必是正相關的關係。其次，這不單純只是翻譯的問題而已，而是牽涉到「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這個大問題（劉禾，2008），與整個知識型轉換的思想大鬥爭有關。雖然向西方學習的壓力

¹³ 但沈國威（2010：157-178）指出，嚴復最初採用的句子短小的四六駢文體極不利於概念的嚴格定義，他後來雖改用古散文體，但句子形式終究會限制新詞的使用。

與潮流，讓如嚴復般的譯者在清末民初的特定時空環境下獲得了不小的發言空間，並在跨文化交流上扮演了如傳教士甚或君王般的關鍵角色，但他們在社會上與學術上仍不免常居於賤民的邊緣位置，即便獲舊體制以「碩學鴻儒」頭銜認可的嚴復亦無法完全倖免。此外，這既然與知識型轉換的思想鬥爭有關，又跟現實的權力鬥爭有關，那麼彰顯不同意識形態立場的殊異譯名，一方面常不免跟其所鑲嵌的意識形態與論述同一命運，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在語意的層面上擁有自己獨立的生命，就像概念雖常呼應社會的發展，卻也有自己的演化邏輯與節奏一樣。最後，譯名與新名詞的取舍還牽涉到整個語意場。一如知識型的概念所提示的，諸般外來的新概念彼此間往往互有關連，故其譯名的決定也常有連動的效應甚或連鎖反應，而非僅憑單一譯名的優劣來選擇。前面提及的習俗、典範，在此理當扮有一定角色。

清末民初新、舊詞交替的現象，其實正是Steinmetz（2008：190-192）所探討的第三種語意變遷的模型，即經由詞彙的輸入而來的激擾所造成的語意變遷。然而，由於他的討論一方面預設了歐洲多語言的背景，另一方面此一跟翻譯有關的研究領域仍待大幅開展，所以可參考之處較為有限，反不如中文世界因此係最為顯著、關鍵的歷史現象，所以已有許多研究累積可供參考。例如，現代中文概念形成的一般過程，可以金觀濤、劉青峰（2009：8）所謂的三階段論來說明：第一階段，「用中國原有的政治文化觀念對西方現代觀念的意義進行選擇性的吸收」；第二階段，學習階段，開始大量引入新觀念，並以較接近西方原意的方式為人理解；第三階段，「對所有外來觀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構，將它們定型為中國當代觀念」。¹⁴

就如我對周人用天取代商人的帝的分析所指出的（湯志傑，2004a），用熟悉解不熟悉（Luhmann，1988），嘗試在兩個不同的詞彙或語言間建立假設性的

¹⁴ 但方維規（2009：130）提醒我們注意，「就近現代漢語學術用語整體發展而言」，選擇性吸收、學習及創造性重構「這三個階段不一定總是以階梯向上的形式出現，它們常常是同時存在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互為因果」。另外亦可與鍾鳴旦（2012）關於文化交流的四個面向或階段的討論相比較。

等值關係（劉禾，2008），毋寧係人情之常。但這就帶出一個關鍵問題：透過翻譯建立起來的這種假設的等值關係是新茁生出來的第三者，可謂是非驢非馬的新品種。更重要的是，它會回過頭來影響原本彼此間沒有關連，係透過它才建立起關係的兩方，讓它們一定意義上也都變成非驢非馬的新品種。這也就是金觀濤、劉青峰所說的，定型後的概念係整合、重構的結果。以這種文化交流所產生的概念為研究對象，我們必須注意它們內含有Koselleck所說的多個時間層次，¹⁵或劉禾（2008：42）援引南亞的底層研究提及的「『多重對立』的共時概念」。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在於後人不但可以，還常常把自己熟悉的晚起概念投射到過去，據此改寫歷史，而且一定意義下也能言之成理。以華夏文明究竟有無社會概念為例，以我所知至少可有四種解法。第一種在我看來有問題的解法是以詞彙的字面依據，或是生硬套用西方的觀念，強調華人早在與西方現代文明遭遇前，就已有與西方類似的社會概念。其次，如多數當代華人學者所強調的，傳統華夏文明在國家與個人間並無社會此一中介層次，相應也無此一概念（如陳其南，1998：Chap. 6, 7；黃仁宇，1993），這也是一般認為的正解。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根據社會概念的視角，主張華人傳統有以荀子「群」的觀念為代表的社會觀，或是對家庭之外的領域主要抱持疏離、疑懼的態度這樣的社會觀（見陳弱水，2004；湯志傑，2004c）。最後，我們還可以在涵括所有溝通此一社會概念的視角下，主張「天下」即是傳統華人用以表達社會概念的用語（Tang，2004），乃至認定在華人傳統中，國家與社會是相混融的（翟學偉，2005：31）。

考慮到概念的歷史深度，以及翻譯實際上是創造出新品種的問題，目前多半僅聚焦於「轉型時代」- 借用張灝（2011）的概念來說 - 的中文概念史研究，我認為有其盲點。¹⁶以我有限且不盡準確的閱讀印象來說，除少數學者如方維規（2003）、馮天瑜（2004）、黃興濤（2006）、金觀濤、劉青峰（2009）等對此問題有所留意，會上溯古代，就古今中西間交互考察外，既有的研究似多把重點放

¹⁵ 需將多個時間層次理解為多元的時間性，而不能如一些英文文獻般將 Koselleck 的歷史時間理論簡單地理解為關於分期的理論而已（Jorgheim，2012）

¹⁶ Koselleck 曾提過「鞍型期」的假設，也惹出不少爭議而備受批評。

在清末民初所謂傳統到現代的轉折上。這本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這的確是最為關鍵的轉型時期。問題是，如果我們只把注意力放在這段時期，而無法有足夠的歷史深度的話，很容易掉入「現在主義」逆溯而上的陷阱。首先，我們挑哪些概念作為研究對象，反映的往往是我們今日的認知旨趣與關心所在，未必便是當時的爭議焦點。其次，這些翻譯過來的概念用的仍是既有的漢字，總帶有我們對於這些漢字的理解和想像，若不從順流而下的角度一併釐清華人既有思想與概念資源的話，不但無法掌握整個翻譯過程的全貌，可能也無法真切地掌握到所研究的概念的所有意涵。¹⁷

要澄清的是，我並非主張我們完全不能用當代的概念描述過去，不能從今日的角度重構過去。事實上，我們始終只能從現在的角度理解過去，而且隨著我們視域的改變，過去一定意義上其實也跟著改變了。因此，我的重點在於，我們必須跳脫直接就以意符代表意符與意指的統一這種「物的圖式」(scheme of things)的觀察方式，而必須提升到二階觀察的層次，觀察過去的人們使用何種區分來觀察世界。如Koselleck (1985: 85, 90) 指出的，重點不在於迴避今日的用語或概念，而在於我們是否**歷史地**對待我們的觀察對象。史學固以個例的知識為主要取向，但並不妨礙我們從歷史研究中抽象出分析概念，將其應用到其他脈絡中，有意識地予以測試和檢驗。只是，我們必須嚴謹地**區別**(歷史)**語意**¹⁸與(學術)**分析概念**的不同。特別是，當應用今日的分析概念研究過去時，必須小心避免Skinner (1979) 指出的，如「望文生義式」的研究常會犯的謬誤，認為某某是現代某概念或學說的先驅，又或何時便早已有當代的那個概念。同時，面對這種狀況幾乎免無可免，我們還可以並應該分析為何人們常會對歷史做這樣的改寫，也就是對這些後起的歷史書寫做二階觀察，藉此了解這些觀察者及其身處的時代與脈絡。

¹⁷ 像方維規對夷、洋、西、外等指稱上的更迭的研究，便有助於我們理解，「蠻夷」是如何在華夏文明的視角中轉換成「外國人」的 (Fang, 2001)。

¹⁸ 關於「語意」(semantics) 一詞，我採取 Luhmann (1980: 18f.: 1995: 163) 的界定：「可供使用的、在較高的層次上一般化了的、相對獨立於情境的意義」，亦即相對穩定的、類型化了的、可供重複使用的意義形式，好幫助人們解決溝通中意義過剩的問題。

最後，儘管概念史的研究與語言學轉向密不可分，而且我也認同社會結構的形成與語言的建構緊密相關的說法，但我仍要提醒，不要陷入過度強調語言的陷阱，因此與社會史的研究配套實是其研究法不可或缺的一環。顯而易見，要對古人所用的概念提出歷史解釋，不能只看語言本身的歷史而已，而必定也要溯及社會史的資料，因為任何語意都與語言之外的內容有關。用 Koselleck (2002: Chap. 1, 2) 的話來說，歷史有其在語言之先及之外的「後設歷史條件」。當我們採取言說行動的語用視角時，不能就此抹煞言說行動與其幫忙準備、引發及執行的行動本身的差異。就像中文裡常會說「可做但不可說」及「可說但不可做」一樣，對概念史的研究來說，可說的／可做的是組必需時時放在心上的區分 (Steinmetz, 1993)。何況言說行動與「真正的」行動在共時的場景中雖交織在一起，但口語、文字以及發生的事件本身在分析上卻是可區隔的，而且在歷史(書寫)中再現出來的(始終只能是個理論建構的)貫時的改變也不會以同於「實際歷史」的時間節奏或時間序列發生 – 儘管我們始終也只能透過語言或文字來經驗這些曾經發生的事物，以致原本在過去現實中可能只是次要因素的語言反過來變成了主要因素。

四、沒落抑或新生：翻譯與相互連結的歷史視角之引入

當概念史的研究取徑日益吸引中文學界的注意時，我們有必要知道，早在幾年前，在「概念史」一詞的正宗發源地德國，便曾引爆過一場關於概念史是否已經退潮，乃至死亡的辯論。發出第一槍的，是曾經參與過概念史相關詞典撰寫計畫，屬於年長世代的Gumbrecht (2006)。正由於他以親身經歷的姿態現身說法，宣告概念史已走入死胡同，故特別讓人感到震憾。他的關鍵質疑之一是，概念史的進路無法面對、處理無法掌握、理解的事物，也就是無法概念化的事物

(Unbegrifflichkeit)，¹⁹例如像隱喻。這背後的德國學術脈絡是，在概念史方興未艾時，日後以《現代的正當性》及《哥白尼世界的源起》等書知名的哲學家 Hans Blumenberg (1960) 便寫了篇〈關於隱喻學的典範〉。²⁰該文雖如Blumenberg 的其他作品般普獲好評，但毋寧要到日後解構蔚為風潮，特別是在 Anselm Haverkamp 高舉隱喻學的大旗後 (Gumbrecht 該文援引的主要也是 Haverkamp 的觀點)，才又重獲流行。若挪用 Palti (2010) 的標題來說，我們似乎可在德國的「思想史」學界看到一個從觀念到概念再到隱喻的發展軌跡。

其實，早在《歷史的基本概念》詞典計畫尚在執行的年代，便有不少學者認為應當也將視覺、隱喻等面向包括進來的聲音，其中包括曾為 Koselleck 助手的 Reichart。日後由他主導的《法國政治與社會概念手冊》(Richter, 1995: Ch. 4, 5) 的重要革新，便在於納入視覺、隱喻的面向，及結合法國心態史與詞彙統計學的進路，設法超越針對個別概念研究所造成的限制，包括運用前人所未開發的史料，如遊戲。

另一方面，Busse (1987) 也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概念史所從事的歷史語意研究的批評與修正建議。對於這些有益的不同聲音，Koselleck 本人毋寧是持開放態度的。就如 Olsen (2012) 一書的標題所彰顯的，Koselleck 是以追求多元的歷史為職志。可是，詞書計劃不可免會造成諸多形式上的限制。如前述，Koselleck 自己便曾打過緊身衣的隱喻。像《手冊》雖將也視覺材料納入考察，但詞典的形式畢竟會在再現上有所限制，將《手冊》與 Reichart 自己的著作相比較，這點便一目了然。詞典某個意義上可說廣大悉備，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書與必備的參考書，但實際上卻又不免掛一漏萬，總無法令人完全滿意。例如，詞條的形式就很

¹⁹ 這涉及一個德文才容許人們如此表達的雙關語，也就是 Begriff (概念) 這個名詞源自 Begreifen 這個動(名)詞，其本意為握，引申有掌握、理解之意。Koselleck 本人便曾玩過這個雙關語遊戲，不但主張「概念與歷史的合致」，更說概念史致力追求的目標是被理解、掌握的歷史 (begriffene Geschichte)。由 Joas 及 Vogt (2011) 編輯，在 Koselleck 過世後題獻給他，專門討論其作品的論文集，便以此為名。

²⁰ 1998 年，在 Blumenberg 辭世 (1996) 後，此文維持原名但以書的形式，偕同他另一本書《歷史中的概念》在 Shurkamp 出版。2007 年，趁著 Gumbrecht 引發關於概念史辯論的風潮，Suhrkamp 便請 Haverkamp 編輯，又幫 Blumenberg 出了一本《關於無可理解的理論》(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難做到 Steinmetz 前面強調的微觀視角的研究。說起來，德國人之勤於編纂詞典，也算世界少見。在《哲學的歷史詞典》、《歷史的基本概念》、《法國政治與社會概念手冊》這三套概念史的代表作之外，另外還有《正宗德語文學科學詞典》（*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2007）、《美學基本概念》（*Ästhetische Grundbegriffe*，2000-2005）等涉及文學及美學的概念史詞典。

儘管如此，如 Palonen（2005b）已指出的，以詞典的形式來進行、推動概念史的研究，日後恐怕不會再有。理所自明的是，概念史的研究當然不會僅能托身於詞典。事實上，《（政權）變革中的概念史？》（Müller，2004）一書的編輯緣由，即在回應各種詞書計畫結束後，概念史如何繼續走下去的問題。詞書這個重要載體形式的消失，毋寧是刺激概念史研究者更認真地面對、思索自己的特色與利基何在這個關鍵的問題。因此，不令人訝異，約略同時且早在 Gumbrecht 發難前，Dutt（2003）便編了本《概念史的挑戰》。至於挑戰與刺激何來，具體而微地顯現在前一年 Bödeker（2002）所編的《概念史、論述史、隱喻史》一書的書名上。換句話說，從 1980 年代以來，概念史便常遭批評，並且需回應、吸納或區隔心態史、詞彙史、論述史、隱喻史等。

Gumbrecht 的說法之所以造成地震，在於儘管概念史以往便常因當紅而成為箭靶，但極少人否認其貢獻，更沒人想完全取消它，遑論膽敢宣告它壽終正寢。不過，在此表面理由之外，我想 Gumbrecht 主張的理論深度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從隱喻的問題切入，Gumbrecht 希望以更為原初的象徵現實的層次作為探究的出發點，因為隱喻沒有指涉的功能，而只有實用的功能（Palti，2010：198，205）。這個無法言傳、無可理解的問題不但會照亮「概念的界限及隱藏面向」，²¹也會帶出透過個別的概念研究所無法回答的決定概念的發聲條件的形式結構為何的問題。不只如此，Gumbrecht 在這篇為其收錄於各詞書的舊作合集重行出版而撰寫的導論中，還以個人撰寫的這些舊作為見證，將其編織到學術潮流改變，特別是「新的認識論環境」的敘事中，批評 Koselleck 所代表的概念史已屬過時需

²¹ 此為收錄 Gumbrecht 該文一書的副標題。

淘汰的研究方案。

對此，我認為 Jordheim（2009）的書評已做出充分的回應，無須我在此複述細節。在此，我只提我認為值得注意的幾點。首先，Koselleck 雖源出詮釋學，但整個概念史的研究進路並非僅是對 Gadamer 的學步而已。Koselleck 最初固然不是從語學言轉向後的立場出發，但卻受其顯響而有所調整。其次，如 Jordheim（2009：214）所辯護的，不對語言指涉的問題做出決定這個在 Gumbrecht 看來的致命缺點，有可能反而正是其最重要與原創的貢獻所在，也就是拒絕先驗地將優位性賦予語言還是現實，而是堅持考察兩者間隨歷史的發展而不斷位移的複雜關係。最後，Gumbrecht 認為在未來已經封閉，而過去卻永遠存於現在，即現在變成一個寬廣的同時性區帶的後現代中，媒介過去與現在的詮釋學努力已失去意義與存在的理由。然而，「不會開始」（Luhmann，1982：Ch. 12）或說「永遠不會到來」（Gumbrecht 語）的未來，其實正是現代的特色，並非後現代才有，而且這跟 Gumbrecht 所說的「拒絕未來」並不同。我們頂多只能說這是回應此種狀況的一種選項，但我不認為這真的是當前的主流。更重要的是，處此過去永不可能真的過去的情境中，了解我們所使用的字詞如何承載過去的意義，並同時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比出姿態，毋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畢竟，我們能進入無可理解的問題及由多元的時間與語意層次組成的複雜系統的唯一管道，仍舊只能是繼續探究意義的問題（Jordheim，2009：217-218）。

無可理解是個真實存在且需面對的問題，但它並不妨礙我們以概念及語言來理解這回世界，反而正好可以說是它們的可能性條件 – 這是解構思潮帶給我們的珍貴觀點之一。回到現實來說，概念史不但在詞書之外有相當的開展，更跨越國別的畛域，在世界的許多角落覓得知音並落地生根。只是其形貌不免有所變化，以致有時乍看之下易誤為概念史的研究已有所凋零（見 Pernau，2012；Steinmetz，2008）

這個新的發展跟這次工作坊的主題「翻譯」緊密相關。早在概念史的黃金時期，超越及揚棄以民族國家為歷史研究及書寫視為理所當然的單位的努力，便

已經開始。概念史的傳統本身便試圖從比較以及傳播、擴散的角度，超越國別的界限。然而，這種作法畢竟仍下意識地預設了國家、文化等等的界限，頂多注意到單向的影響，而未意識到彼此的發展其實常是互相連結在一起，糾結而不可分。晚近這個相互連結的史觀，在世界史或全球史的領域裡更日益取得主流的地位。這不令人訝異，因為如果我們如實地面對現代社會形成的歷史的話，將清楚地認知到，現代社會無可否認就是一個世界社會，因此勢必得從世界的格局來探討它。以往認定現代性最初僅源起於歐洲，日後才隨十九世紀第二波的殖民主義擴散到全世界，引發各種學習或抗拒，其實是歐洲中心論的論述製造出來的神話。從解殖的認識論立場來看，現代性根本就是在世界各地共同形成一個系統的過程中，經由彼此的互動形塑出來的。打從一開始，它就是個相互糾結的現代性（湯志傑，2013）。

考慮到事實如此，那麼對伴隨並促成現代社會誕生的現代概念的探討，必定也要從這種相互連結、共同演化的歷史的視角出發，才不致有所偏。這種觀點與晚近翻譯研究的潮流相呼應，也就是不再預設只有從本源語向目標語／接受語的單向流動，而是注意到相互影響的事實，並「賦予主方語言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劉禾，2008：37）。換句話說，即便是被迫接受，也總有接受者主動選擇的一面。

這種相互連結的視角在中文的概念史研究裡，已日漸成為常識。例如早期的研究者多只注意到中國對日譯新名詞的單方向採借，但現在的學者卻會從中西-日的文化互動的角度來探討新名語的形成（如見馮天瑜，2004：29-31）。用沈國威（2010：22）極能彰顯此一視角，儘管不免仍帶少許漢字中心色彩的話來說：「近代新詞的形成並非一個國家、一種語言之內的事件，而是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如何用『漢字』這一超語言的書寫符號來接受西方新概念的問題」；它們是「共創、共享的產物。中國和日本是主要的創造者，朝鮮半島、越南等參與了共享」。

可惜的是，一如這段引文所反映的，目前的研究多半只把目光擺在十七世

紀以來東西文明接觸後，東方對西方文明與概念的接受上，仍未經後殖民知識革命的洗禮，反過來看對東方文明在與西方互動中對西方造成的影響。眾所周知，啟蒙哲人往往藉對中國的想像發揮自己的立論。從這個眾人熟知的例子來看，不管中國意象扮演的是正面還是負面角色，「現代概念」的形塑，不能不把中華帝國考慮在內。就這個問題來說，鍾鳴旦（2012）以十七世紀的中國為個案就文化接觸的方法論所做的討論與反省，整理出傳播式、接受式、創新式以及互動及交流式四種框架，分別評論其優缺點，值得參考。我們固然不宜夜郎自大，但也不應劃地自限。以利氏世界地圖為例，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在地學者的參與及貢獻。從糾結的現代性的觀點重新審視現代中文概念形成的問題，或許能帶給我們之前所未有的新收穫。

至於就實際的翻譯研究來說，Reidchart（？）曾指出就一再被翻譯的作品進行版本比對的重要性。我曾請助理整理明末以來多次被譯的西書的相關資料，令我感到訝異的是，依初步的印象來看，一再被翻譯的西方作品的比例其實相對極少。真正稱得上「一再」翻譯的，往往不是經典著作，而是帶有時代色彩與運動意涵的「宣言」，如美國的獨立宣言及共產黨宣言，而潘光哲（2008）及陳衛力（2008）已對這兩份宣言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另外，如前面引述沈國威漢字文化圈的說法所提示的，就同一份文本在東亞不同語文與國度的譯本進行研究，毋寧也是極具意義的。記得前陣子收集資料時，我曾讀到過某位韓國學者的一篇比較文章，似是探討中、日、韓文關於民約論（？）的譯介，我覺得這是個值得開發，而國內目前的耕耘卻似乎相對較少的面向。此外，身為社會學家，我覺得馮天瑜（2004：19）已經看到的翻譯的社會條件差異的問題，亦是應重視的問題。我想我已撈過界太多，獻醜不如藏拙，就不多說廢話了。

參考文獻

方維規，2003：〈“經濟”譯名溯源考：是“政治”還是“經濟”〉，《中國社會

- 科學》2003/3：178-188。
- 2009：〈歷史沈澱於特定概念〉，《二十一世紀》111：124-131。
- 汪暉 (2004)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
- 沈國威，2010：《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
- 金觀濤、劉青峰，2009：《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
- 張灝，2011：〈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收於許紀霖、宋弘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頁 3-1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陳其南，1998：《傳統傳度與社會意識的結構》，台北：允晨。
- 陳衛力，2008：〈讓語言更革命：《共產黨宣言》的翻譯版本與譯詞的尖銳化〉，收於孫江編，《新史學，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頁 189-210。北京：中華書局。
- 馬西尼 (Federico Masini)，1997：《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馮天瑜，2004：《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
- 湯志傑，2004a：〈封建帝國的形及其分化〉，《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6:63-112。
- 2004b：〈藉公共領域建立自主性(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0:121-184。
- 2004c：〈藉公共領域建立自主性(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1:173-255。
- 2009a：〈本土觀念史研究芻議：從歷史語意與社會結構摸索、建構本土理論的提議〉，見鄒川雄、蘇峰山編《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頁 313-366。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2009b：〈從一磚一瓦煉起：本土概念／觀念史研究的提議〉，發表於「第二屆海峽兩岸社會學理論學術研討會」，中國北京：中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2009-05-08 ~ 2009-05-10。

— 2013：〈現代性的實驗室：從多元現代性的觀點詮釋台灣在世界史中之意義的嘗試〉，發表於「形構臺灣：知識生產及其脈絡 – 台灣大學文學院邁頂計畫團隊暨『知識／臺灣』學群學術會議」，台北：台灣大學台灣研究中心，2013-09-21。

章清，2012：〈近代中國留學生發言位置轉換的學術意義：兼析近代中國知識樣式的轉型〉，收於氏著，《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黃仁宇，1993：《中國大歷史》。台北：聯經。

黃克武，2008：〈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2：1-42。

黃興濤，2006：〈晚清民初現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近代史研究》2006/6：1-34

劉禾，2008：《跨語際實踐 – 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

潘光哲，2008：〈「革命理由」的「理論旅行」：美國《獨立宣言》在晚清中國〉，收於孫江編，《新史學，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頁144-188。北京：中華書局。

蔡錦昌，1987：〈從中西思想之分際談儒家社會思想研究問題〉，《東吳政治社會學報》11:325-336。

— 1996：《拿捏分寸的思考：荀子與古代思想新論》，台北：唐山。

— 2001：〈概念與名義：對「二元與二氣」問題的補充說明（回應稿之三）〉。
(<http://mail.scu.edu.tw/~reschoi3/choi/YC-response3.RTF>)

鍾少華，2012：《中文概念史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鍾鳴旦 (Nicolas Standaert)，2012：〈文化接觸的方法論：17世紀中國的個案研究〉，收於姚平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第四卷：宗教史卷》，頁283-327。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lumenberg, Hans, 1960: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6: 7-142.

Blumenberg, Hans, 1998a: *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Frankfurt a.M.: Suhrkamp.

Blumengerg, Hans, 1998b: *Begriffe in Geschichte*. Frankfurt a.M.: Suhrkamp.

Blumenberg, Hans, 2007: *Theorie der Unbegrifflichkeit*. Frankfurt a.M.: Suhrkapm

Boas, George, 1973-74: "Idea," pp. 542-549 in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Volume 2?*, edited by Philip P. Wiener. New York: Scribner.

Bödeker, Hans Erich (ed.), 2002: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Göttingen: Wallstein.

Bourdieu, Pierre, 1995: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runner, Otto, Werner Conze & Reinhart Koselleck (eds.) (1972-1997).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8 Volumes*. Stuttgart: E. Klett.

Busse, Dietrich, 1987: *Historische Semantik: Analyse eines Programms*. Stuttgart: Klett-Cotta.

Dutt,Carsten, 2003: *Herausforderungen der Begriffsgeschichte*.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Fang, Weigui, 2001: "Yi, Yang, Xi, Wai and Other Terms: The Translation from 'Barbarian' to 'Foreign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95-124 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edited by Michael Lackner, Iwo Amelung & Joachim Kurtz. Leiden: Brill.
- Gallie, W. B. 1955-56: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New Series*, 56: 167-198
- Gumbrecht, Hans Ulrich, 2006: "Pyramiden des Geistes: Über den schnellen Aufstieg, die unsichtbaren Dimensionen und das plötzliche Abebben der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Bewegung," pp. 7-36 in *Dimensionen und Grenzen der Begriffsgeschichte*. München: Fink.
- Haller, R. 1971: "Begriff," pp. 780-785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nd 1*, edited by Joachim Ritter. Basel: Schwabe.
- Holmes, Stephen, 1987: "Poesie der Indifferenz," In Baecker, Dirk et al. (eds.) *Theorie als Passion*. Pp. 15-45. Frankfurt: Suhrkamp.
- Holmes, Stephen, 1996: *The Anatomy of Antiliberal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wang, Jinlin L., 1995: "Contesting the Sacred: A Discourse-Centered Approach to the May Fourth Culture Movement," 《中國社會學刊》 18 : 193-242 。
- Joas, Hans & Peter Vogt, 2011: *Begriffene Geschichte: Beiträge zum Werk Reinhart Kosellecks*. Frankfurt a.M.: Suhrkamp.
- Jordheim, Helge, 2009: "Begriffsgeschichte According to Gumbrecht – Or: What Meaning Can and Cannot Convey," *Redescriptions: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Conceptual History and Feminist Theory* 13: 209-218.
- Jordheim, Helge, 2012: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History and Theory* 51: 151-171.
- Koselleck, Reinhart, 1972: "Einleitung,"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 Reinhart 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Vol. 1. Pp. 13-27. Stuttgart: Klett.
- 1985: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1989: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1, 649-666.
 - 1994: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Change,” In Melching, Willem & Wyger Velema (eds.)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Pp. 7-16. Amsterdam: Rodopi.
 - 1996: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Hartmut Lehmann &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Pp. 59-70.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 2002a: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b: “Social History and Conceptual History,” In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Pp. 20-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 *Begriffsgeschichte: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Frankfurt a.M.: Suhrkamp.
- Lehmann, Hartmut & Melvin Richter (eds.) (1996).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 Luhmann, Niklas, 1980: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Vol. 1*. Frankfurt: Suhrkamp.
- 1982: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8: “Familiarity, Confidence, Trust: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 pp. 94-107 in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edited by Diego Gambetta. New York: Blackwell.
 - 1994: “Ansprüche an historische Soziologie,” *Soziologische Revue* 17, 259-264.
 - 1995: *Social System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inhardt, H. 1976: “Idee: Antike,” pp. 55-65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 Philosophie, Band 4*, edited by Joachim Ritter. Basel: Schwabe.
- Müller, Ernst (ed.), 2004: *Begriffsgeschichte im Umbruch?* Hamburg: Felix Meiner.
- Neumann, K., 1976: "Idee: Kant," pp. 113-119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nd 4*, edited by Joachim Ritter. Basel: Schwabe.
- Olsen, Kiklas, 2012: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New York: Bergbahn Books.
- Palonen, Kari, 1997: "An Application of Conceptual History to Itself," *Finnish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1: 39-69.
- 1999: "Rhetorical and Temporal Perspectives on Conceptual Change," *Finnish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3: 41-59.
- 2004: *Die Entzauberung der Begriffe: Das Umschreiben der politischen Begriffe bei Quentin Skinner und Reinhart Koselleck*. Münster: LIT.
- 2005a: "A Train Reading Marathon: Retrospective Remark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descriptions: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Conceptual History* 10: 160-175.
- (帕羅內), 2005b: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 (《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 李宏圖、胡傳勝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Palti, Elías José, 2010: "From Ideas to Concepts to Metaphors: The German Tradition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Complex Fabric of Language," *History and Theory* 49: 194-211.
- Pernau, Margrit, 2012: "Whiter Conceptual History? From National to Entangled Histories,"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7(1): 1-11.
- Prunč, Erich, 2007: "Priests, Princes and Pariahs: Constructing the Professional Field of Translation," pp. 39-56 in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edited by Michaela Wolf & Alexandra Fukar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Redaktor, 1976: "Idee: Mittelalter, " pp. 101-102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nd 4*, edited by Joachim Ritter. Basel: Schwabe.

Reichardt, Rolf & Eberhard Schmitt (ed.), 1985-2000: *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 München: Oldenbourg.

Richter, Melvin, 1995: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kinner, Quentin, 1970: "Convention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79), 118-138.

— 1971: "On Performing and Explaining Linguistic Action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1(82), 1-21.

— 1994: "The Study of Rhetoric as an Approach to Cultural History: The Case of Hobbes," In Melching, Willem & Wyger Velem (eds.)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Pp. 17-53. Amsterdam: Rodopi.

—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inmetz, Willibald, 1993: *Das Sagbare und das Machbare: Zum Wandel politischer Handlungsspielräume England 1780-1867*. Stuttgart: Klett-Cotta.

Steinmetz, Willibald, 2008: "Vierzig Jahre Begriffsgeschichte – *The State of the Art*," pp. 174-197 in *Sprache – Kognition – Kultur: Sprache zwischen mentaler Struktur und kultureller Prägung*, edited by Heidrun Kämper & Ludwig M. Eichinger. Berlin: de Gruyter.

Suter, Andreas, 2005: "Kultu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Chancen und Grenzen," pp. 27-55 in *Was heißt Kultu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edited by 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Tang, Chih-Chieh, 2004: *Vom traditionellen China zum modernen Taiwan: Die*

*Entwicklung funktionaler Differenzierung am Beispiel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and
des Religionssystems.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